



这是一颗锋利的钢钉，它刺破了大兴安岭茫茫林海，钉在了——一棵樟子松身上。

我一直想见识这颗钢钉，这和早年我的老师肖增伍的讲述有关。然而，一切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——时间上的距离是80多年，地理上的距离是乘火车从北京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满归镇，再驱车走进阿巴河岸边的山地。

终于，我为此启程，在原始森林里驱车而行。细若游丝的路，密不透风的林子，人与车像是被扣在一个绿色的大盆里。肖老师描述的场景在哪里？仿佛一切都不曾存在，别说那棵带着钢钉的树，我甚至找不到那个光秃秃的操场。森林如海，大大小小的樟子松、白桦和落叶松，无数杜香和兴安杜鹃、越橘，已经演替了将近一个世纪，其阵仗不知道有过多少改变。那棵带着钢钉的树，早已无法显现肖老师所形容的装模作样的样子了。当年那片砍伐了树木打造成的操场，也已经成为一片次生林地。

靠朋友引领，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坐落在阿巴河畔的“关东军栖林训练营”遗址，也找到了那棵带着钢钉的樟子松。那颗钢钉居然没有锈迹斑斑，没有因为树干的皴裂而脱落入土，仍然留在那棵树的躯干上，冷光依稀可见。

这颗钢钉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侵略与反抗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军侵占东北，将魔爪伸向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，公然把浩瀚的森林占为己有，并对鄂温克猎民进行种种欺压盘剥。他们切断了鄂温克猎民同外界的商业联系，强买强卖，用火柴、弹壳之类的小东西，强行换取猎人们辛苦得来的皮货……

1940年，日本侵略者在阿巴河北岸建立了这个训练营，收缴了鄂温克猎人的枪支，中断了他们的狩猎生产，并扣押了他们的口粮，将他们集中囚禁在这里，进行奴化教育和军事训练，让他们学日

语、学格斗，向他们灌输效忠日本天皇的思想，目的是让他们成为抵御抗日力量的炮灰。

被留在山林里的鄂温克老弱妇孺，由于饥寒，很多疾病开始蔓延，据记载，其间有200多人死亡。到1945年二战结束，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的鄂温克猎民数目已大不如前。

这是一处绝境。当年侵略者逼迫鄂温克猎民在悬崖峭壁一侧砍光树木，倚山建起一座23米长、7米宽的木刻楞营房。拓出一片平地做操场，操场上仅留下了这棵樟子松。营地背后是高山丛林，前面是骇人的深渊，深渊底是湍急的阿巴河。即使是酷暑，流水也能冰死人。更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虎视眈眈的狼狗把守，任何被囚禁的人，想逃出去，难于上青天。

朋友告诉我，那颗钉在樟子松上的钢钉，产自二战时期的日本，是用来拴狼狗的，也用来捆绑折磨敢于反抗的鄂温克猎人。

此时此刻，大森林蓊郁静谧。踏在繁厚的腐殖质层上，我虽然感受到了脚下残存的平坦，却看不到些许裸露的泥土。后山上的大森林，年年孕育松子，落地生根。风也助力，将这里还原成了小树密布的次生林。我在茂密的树丛中走着，一不留神就到了当年操场的边界，也就是阿巴河北岸的悬崖边——只差半步就会跌落于滔滔河水中。

转身离开那棵带着钢钉的大樟子松，我走进那栋炮火烧燎过的木刻楞营房。这样的房子，我在雅斯纳亚·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见过，少年时代在海拉尔见过，它们曾给予我美的遐思。时至今日，眼前的这栋旧木刻楞房子更像是大森林里的一块伤疤。

木刻楞住房是地球之北森林居民的智慧结晶。人们就地取材，选用两头同样粗细的大圆木，用手工刀斧打造，使用榫卯结构垒建成房屋主体墙，用苔藓填充圆

木间的缝隙保暖。木刻楞房子外观大气，内部宽敞，且冬暖夏凉。这排残存的木刻楞房子却不同，窗户矮小，空间逼仄，显然是刻意所为。这房子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颜色，黢黑而幽暗。退后一二十米看去，这个场景就像一幅屠格涅夫小说的铅笔插图。

通过古新军的纪实文学作品和龚宇的著作，我了解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以及这个训练营的终末。

彼时，被囚禁的鄂温克使鹿部落猎民，虽然远在深山，但也知道了抗日力量的存在，他们在牢狱般的训练营里盼望着脱离苦海的时刻。侵略者的眼睛时刻监视着，猎人们稍有违背命令，就会立刻被绑在那带钢钉的大树上殴打折磨。由于实在无法忍受日本侵略者的酷刑，一个年轻猎人在训练中突然走向悬崖，纵身一跃，跳入了湍急的阿巴河。阿巴河把他送入了额尔古纳河，额尔古纳河把他送到了遥远的大海，而仇恨就这样留在了悬崖之上，留在了那些忍着泪水目送他远行的鄂温克猎人心中。

反抗的情绪，无声而猛烈地滋长着。“反法西斯大决战就要开始”的消息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在训练营里不胫而走。猎人们在日本兵注意不到的角落，低声商讨着逃逃的方案，等待着时机到来。终于，深山老林里响起剧烈的爆炸声，随即营地一片火光，木刻楞房子被炸掉了大半，日本兵乱作一团。早有准备的鄂温克猎人冲出了营地。大山近在咫尺，他们趁风飞快上山，隐入森林。一段艰难的跋涉后，猎人们回到了鄂温克营地，见到了当地鄂温克猎民的带头人昆德伊万。

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。昆德伊万决定带领鄂温克人即刻出击，助战抗日，拦截逃军的侵华日军。他背起猎枪，手握劈山开路的大刀，振臂一呼，猎人们二话没说，拿出了储备的子弹，牵着最强壮的驯鹿迅速集结起来。妇女们为丈夫和儿子

车担，曾是一个小村的名字。当年里下河地区水网纵横，交通极为不便，除了其所在的镇，几乎没人知道地球上还有个车担村。改革开放后，车担村被合并进大村。如果不是车担卜页远近闻名，车担这个村名可能早已被乡亲们淡忘。据记载，车担卜页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，采用铁锅烧浆、柴火慢煮、盐卤点制，经过“浸、磨、滤、煮、卤、浇、榨、剥”等10多道工序手工制作而成。成品的车担卜页，远看色如金、纹如绢，凑近可闻到淡淡的黄豆清香，尝一口，细腻、有韧劲、有嚼劲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身处边陲的我在《新华日报》曾读到一则题为《车担卜页飞上天》的新闻。A4纸大小的卜页，每斤黄豆至少能制作十八九张，最多可制作25张之多。人们形容其“薄如纸”“柔似绢”“韧性强”。如此来看，车担卜页“飞上天”倒有几分贴切了。

年逾六旬的王福江老人，家中从祖辈起就传承着车担卜页的制作手艺。如今家乡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王福江老人再也不用像前辈们那样，挑着沉重的豆腐担子走村串户叫卖了。他告诉我，每天百十来斤黄豆做成的卜页，足不出户便销售一空，且供不应求，哪怕是左邻右舍，都得提前预订，每逢节日更是从早到晚，制作不停。

一个地处里下河深处的偏僻小村，连村名都早已消失，为什么能凭借一道寻常的豆制品远近闻名？一位老师告诉我，车担卜页成为众口相传的品牌不是偶然，这是坚守的力量。家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人间有三苦，行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”磨豆腐的苦在于起早，每天半夜两三点钟就得起床推石磨，磨豆浆，从选黄豆到制作豆腐卜页都是体力活，而且利润微薄，没有定力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。祖孙三代做这件事，并做好这件事，这样的坚守实在不容易。用王福江的话来说：“过去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劳作，如今是满足大家生活需要。大家的认可可是我最大的财富！”这也是“车担卜页飞上天”的奥妙所在吧！



# 大兴安岭森林中的一颗钢钉

艾 平

准备了肉干、列巴，还有深深的祝福……一支狩猎者的队伍，扛着原本瞄准禽兽的猎枪，牵着长于翻山越岭的驯鹿，走向了反侵略的战场。

他们穿林地过长河，抵达艾雅苏克河畔。这里有一条隐秘的小路，是当地人口耳相传的“鄂温克小道”。他们算准了，日军撤退时要途经此地。他们的眼睛躲在树叶下，耳朵像猓猓那样搜寻着每一丝动静。时间静静地流逝。突然，猎人们听到了树枝被踩倒的声音和日军说话的声音，还有马匹嘶鸣的声音。

精良枪炮看起来是侵略者手中的胜券，其实未必。在别人的家园里横行霸道，一头驯鹿和一只小鸟都不会驯服，一草一木都会成为反抗的帮手。日军的马在倒木横躺竖卧的林间一步一陷，他们的眼睛被茂密的树林和满天的飞蝗遮挡，完全看不到几米开外是什么地形，只好靠手里的武器恐吓，抓到一个鄂温克人给他们带路出山。

日军的队伍近了。出乎意料，走在前面的竟然是一个鄂温克人，还牵着一群驯鹿！昆德伊万冲着那鄂温克人大喊一声：“快趴下！”随即一枪一个准，打倒了走在前面的日军。意欲还击的日军胡乱地射击，但不知道哪一片林子中埋伏着袭击者。

经过一场激战，几天前还在训练营折磨鄂温克猎民的这股日军，命毙大兴安岭……

8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，这里属于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的一部分，人迹罕至，生态如初，是万类生灵乐园。

我想，那颗远渡重洋、留在80多年岁月里的钢钉，有一天将会在大自然的万物演替中，与那棵苍老的樟子松一起倒下，那一排残破的木刻楞营房也将化为泥土。大地收纳所有的过往，将所有的惊心动魄变成芬芳沃野。而我此刻的讲述，是为了记忆永存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



大地

▲油画《苇塘小景》，作者江平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## 黔灵山

千海兵

黔灵山推窗可见  
贵阳城高耸的发髻  
如松涛奔涌  
公园门口的湖水半掩  
云岩蜿蜒的烟火

有灵猴三两只  
白鸮七八枚

从家里的阳台俯望下去，可以见到高大宽阔的防洪堤，堤外就是黄绿相间的鸳鸯江。

想想，这辈子跟江水真的有缘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因工作需要走遍广西各地，在不少江水流淌过的地方都短暂居住过，邕江流过的南宁、漓江流过的桂林、柳江流过的柳州、金城江流过的河池……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定居梧州，在鸳鸯江畔一住就是半个世纪。我的心中一直记挂着两条江水，一条是家乡梧州的韩江，是我的血脉所系；一条是第二故乡梧州的鸳鸯江，是我日日相对的知音。

家乡潮州人有句话：出门一看韩江横。小时候，韩江就“横”在我家门前，它是我的玩伴，我常常跟小伙伴们在江里游泳玩耍。长大后，韩江是我的码头，我一次次坐船离开家乡又归来。韩江水浑厚，江风里总是混着微腥而亲切的气息。韩江在古代叫恶溪（鰲溪的谐音），因这条江里有很多巨鳄鱼出没，伤害当地百姓，所以得名。一直到唐朝，韩愈在此治鳄，恶溪

不再恶，人们为纪念他才改名韩江。我们这里的小孩几乎都会熟诵韩愈的《祭鳄鱼文》。韩愈这位大文豪与潮州的渊源虽然仅有短短的8个月，但他却给这个小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尤以教育方面最突出，晴耕雨读成为这里人的传统观念。我儿时家境贫寒，不识字的母亲咬着牙也要供我读书，直到我考上大学。记忆中，我跟母亲在同一盏煤油灯下，织布，我念书。见我贪玩不学习，母亲就用韩愈的故事教育我，故事都是她听来的，长大后我才知道，那些故事很多都是后人虚构在韩愈身上的。可能在母亲心里，韩愈就等于文化知识，如同韩愈就等于韩江。

梧州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梧州跟潮州很像，城市都是环山绕水。鸳鸯江是桂江与浔江的交汇之处，桂江水清，碧如翡翠；浔江水浊，黄似琥珀。一清一浊，泾渭分明却又难舍难分，因此得了“鸳鸯”这个美丽的名字。鸳鸯江水见证着我从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，见证着我生活的奔波、失落和收获。每当遇到什么烦心事、难解事，我就会到鸳鸯江畔散步，一边走一边向江水倾诉，脚下的涛声哗啦啦，像是回应我内心的提问。

有一次，我得到一个升职机会，但要离开我热爱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，这是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。我热爱文学，每每看到好文章，心中就无比充实。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，我对好稿子从不会“审美疲劳”。是继续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还是踏上仕途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这两个念头在我脑子里，如同眼前这一清一浊的两条江水在推搡揉搓。站在“鸞江春泛”的亭子凭栏远眺，

世上有卖有买的东西才上秤称量，贱称其重，斗量其容。能进行买卖的，大都是人们所需、受人喜欢的物品。“缺点”是人的毛病，躲之、烦之、弃之，唯恐不及，哪还有人买？还称它干啥？

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但人类要进步，社会要发展，就得不断克服缺点。克服缺点的前提是正视缺点，不把缺点上秤看看斤两，就难以有清晰准确的认知，进而影响缺点的改正。所以，缺点还真得好好称一称。

在社会生活中，人们如果只凭肉眼“估堆”买卖很难交易成功。即便完成了交易，一方也可能产生吃亏上当的感觉。采用双方都认可的度量衡，进行精确量化，相对而言可较愉快地完成交易。要把人的缺点、问题量化是有难度，但也不是办不到。比如说明代万历皇帝，可以说“因种种原因，疏于朝堂之事”，也可以说“三十年不上朝”。后一种说法，不就把这件事的程度量化出来了吗？

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，讲成绩，滔滔不绝，仓满囤堆；讲问题，蜻蜓点水，笼统概括；某某工作认识不到位，措施不得力，成效不显著，还有提升的空间，等等。简而言之，面对缺点问题，用模糊语言代替了“上秤”量化。群众对这类现象非常反感。

给缺点称重，使之以一定数量、程度明确呈现出来，对评价一个人、一个领导班子、一项事业的发展来说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含糊不得。是接受宴请1次，还是接受宴请20次；是安排10个亲属工作，还是走后门安排10个亲属，不仅数量上、程度上有差异，“量变引

起质变”，有时性质也会发生变化。大往小说，重往轻说，不合适，不允许；小往大说，轻往重说，夸大事实，无限上纲，伤害团结，制造分裂，后果更加严重。我们对缺点、问题，一定要实事求是，量化准确，恰如其分。

敢不敢对自己的缺点称重，可以看出一个人对错误危害的认知能力。能自己发现缺点，掂量出缺点的分量，就有可能及早解决和克服，避免大的“翻车”。陈胜、李自成都是历史上的例子，他们不注意发现和称重自己的缺点，在取得一时胜利之后又一步步走向失败，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是被自己的缺点打败的。也不乏正面的例子，战国时期的西门豹发现自己脾气急、易误事，便采取佩戴韦（熟牛皮）的方式，时刻提醒自己一要平缓。春秋时期的董安于认为自己性子过慢，便佩剑提示自己紧张起来。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问题，所以才能有针对性地改进。

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。单靠自己还是不够，还应请别人帮着对缺点称重，不仅“闻过则喜”，而且要知道“过”的多少。中国古代设置谏臣，听言纳谏是千年智慧。

在今天发展建设的实践中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敢于让缺点问题逐一“上秤”，无疑是值得重视和提倡的好风气。唯有真抓实干、标本兼治、久久为功，才能让小至个人、大至国家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

在今天发展建设的实践中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敢于让缺点问题逐一“上秤”，无疑是值得重视和提倡的好风气。唯有真抓实干、标本兼治、久久为功，才能让小至个人、大至国家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



杨树遍布新疆大地，包括帕米尔高原东麓的阿克陶。9月的杨树或排成片，村道、公路甚至雪山下，都立着杨树。天气干燥，杨树梢的叶片发白，远远望去，竟像开了花。

在这块土地上，很自然地想起矛盾的《白杨礼赞》。那些“参天耸立，不折不挠”的白杨也在阿克陶生长着。车子在高原上行驶，连绵的巨石山峰巨神般矗立。苍茫天地间，涌起的感受和当年矛盾写的如此相似——“雄壮”“伟大”。窗外的杨树或成排挺立，或只是三五株，叶

子在灼热风中沙沙作响。它们的存在使寂寥大地有了生机。杨树的根系发达，具有极强的固土能力，耐旱，耐高温，耐盐碱，是新疆当之无愧的“天选之树”，也是重要的绿洲生态屏障。

去阿克陶县的木吉乡看火山口，遇见一名朴实的青年：木吉乡的干部小任。小任是甘肃人，在四川念的大学，毕业后考编来到木吉乡政府。去年，他娶了当地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女儿为妻，从此定居。小任说到新婚妻子，眼里漾起笑意，一脸幸福地从手机里调出去云南拍的结婚照。照片上，两人都笑容灿烂。

“父母来过阿克陶吗？”“来过，他们觉得这挺好。”小任说自己也出身乡村，深知基层工作的分量。就说阿克陶，早些年，还有不少生活在

大山深处的村民，住在屋棚中，靠放牧牛羊过活，翻山越岭是常态，他们对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。后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出台，数千名牧民陆续迁出偏远高寒的深山。他们中有的继续代人放牧，有的做手工艺活，还有的从事种植或个体经营。

高原紫外线把小任的脸膛晒得黑红，他神情中有种笃定，和这方土地建立了深厚连接的笃定。阿克陶，他将在此养育孩子，展开工作，他会像路旁的杨树般扎根。

钻天杨、白杨、苦杨、密叶杨，还有最为人知的胡杨树，它们全都一样粗犷而优美，一样沉默而坚韧，一旦立在了这方土地，它们努力将根系深扎，生枝长叶，抵挡沙尘。胡杨树尤其如此，它们能活100年以上。每棵长于斯的杨树都有与土地相遇的机缘，它们不能选择风从哪个方向吹来，种子落在何方，但一旦落下，便在那里生出根系，将命运植入土壤。树如此，人亦如此。

离开阿克陶的那个上午，望见窗外有一片黄色的树，跃动着秋天的明亮。我用手机拍下，作为对阿克陶的记忆，连同一路的雪山河流、戈壁绿洲，还有遇见的人。车子驶出县城，公路两旁的杨树掠过。那一刻，我蓦地反应过来——那窗外的一片金黄正是白杨啊！

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，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在梧州举行会议，我牵线请来了几位大作家给孩子们做讲座，孩子们因文学而兴奋的表情让我充满幸福感。我一直没有忘记过那种幸福感。在我编发的稿子获得读者共鸣的时候，在一些无名作者因频繁发表作品而逐渐被人所知的时候，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幸福感。追随这种幸福感，我在副刊编辑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了退休。

如果说韩江是在我的情感中流淌，那么鸳鸯江就是在我的现实中奔腾，江上的渔火，码头的声声，连同岸边大榕树下飘来的粤曲小调，都组成我最踏实的日常。韩江在我记忆的源头闪着波光，鸳鸯江在我现实的枕畔唱着夜歌。每到深夜，城市的灯光暗淡下来，两岸的景色都陷入了黑暗当中，只有江水在月光下默默地流淌。真像啊，我竟分不清脚下的这条江水，到底是韩江还是鸳鸯江。我仿佛听见，看不见的远方，有另一条江的涛声正与之应和。

陈蔚文

